

中西学术文丛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D. C. TWITCHETT

唐代財政

[英] 杜希德 著 丁 俊 译



中西書局

 中西学术文丛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D. C. TWITCHETT

唐代財政

[英] 杜希德 著 丁 俊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财政/[英]杜希德著;丁俊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5
ISBN 978-7-5475-0532-8

I. ①唐… II. ①杜… ②丁… III. ①财政史—中国—唐代 IV. ①F81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741 号

Copyright ©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70 (2d 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唐代财政

[英]杜希德 著 丁俊 译

封面题签 徐俊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2.875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532-8/F·009

定价 45.00元

杜希德先生生平

麦大维*

—

杜希德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出生于 1925 年 9 月 23 日，是家中长子。他的父亲克里斯宾·特威切特 (Crispin William Twitchett) 生于 1897 年 8 月 5 日，死于 1979 年 8 月 6 日，是位建筑装饰设计师，主要设计教堂和大型住宅的铁制构件。母亲格拉迪斯·特威切特 (Gladys Claire Twitchett) 本姓高夫 (Goff)，生于 1898 年 5 月 1 日，死于 1969 年 1 月 8 日，俄国血统出身。她的祖父 1870 年由俄国迁居瑞士，父亲在瑞士生活到五岁，之后去了英国。这个家族最初姓 Zvezdakoff，到瑞士后改 Swezdakoff，到英国改为高夫。对于杜希德而言，俄国血统纯属“新闻”，他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因为二战期间海军经历而接

* 译者按：麦大维 (David McMullen) 教授曾任剑桥大学第八任中国学教授、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是国际著名的唐史研究专家，被誉为近三十年来在欧美最被认可的中国文史研究领域权威之一，出版有《唐代国家与儒士》(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等论著，1994 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麦大维早年师从杜希德教授，本文为麦大维为英国科学院撰写的杜希德生平，完整生动地勾勒了杜希德非凡的学术生涯和研究贡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受安全审查时才听闻此事。

1941年5月14日经赫斯顿（Heston）教区肯辛顿（Kensington）主教认可，杜希德成为英国教会成员。虽然他随后并不奉行教律，但几十年后，他很支持妻子对圣公会的虔诚信仰。他先在艾尔沃斯郡（Isleworth）学校读书，之后得国家奖学金资助，到剑桥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学习地理。二战打乱了他的学习生涯，1942—1943年他进入利物浦大学，成为海军预备学员，学习地理。在这里，中国地理课引发了杜希德最初对中国的兴趣。他又在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接受了六个月的日语集训，之后到锡兰皇家海军情报局出任日语官员。

这段服役经历积累了不少人脉，一直伴随着他。1970年他任命皇家海军中校斯洛斯（R. P. Sloss, 1927—2007）出任中国研究讲师职位时遇到了国防部的麻烦，杜希德就联系一位当时已是高层的老战友摆平了此事。

1946到1947年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47年到1950年他在剑桥念东方学本科，老师是夏伦（Gustav Haloun, 1898—1951）教授。后者曾在莱比锡受教育，二战后负责大学图书馆中国学的馆藏配备。1949年杜希德修完第一部分东方语言，第二年接着修第二部分，夏伦教授和戴维斯教授（A. R. Davis, 1924—1983）是考官。杜希德都是优。第二部分结束后，他得到了东方学系（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授予的东方语言专业布朗奖（E. G. Browne Prize），同时得奖的还有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麦基洛普（B. C. McKillop, 1921—1989），同时，他还当选圣凯瑟琳学院学者（Scholar of St. Catharine's）。麦基洛普后来到悉尼大学教书，不过，和杜希德比起来，无甚著述。他就是杜希德嘲讽的那种“绝对的述而不作型”。杜希德敢这么说，正基于自己持续著述的职业精神。

其他中国学学生仅得到第二等 (Upper Second) 的成绩。杜希德读书时代的中文老师是杨旺焕 (音译) 夫人。杜希德虽然和他的同辈汉学家一样, 受过口语的基本训练, 不过他始终不能流利操持汉语。就他而言, 他不大情愿说汉语, 还在于他对当时中国政治运动的复杂情绪。杜希德学过儒家四书, 老师是剑桥中国学教授翟理斯 (H. A. Giles, 1845—1935) 的接班人慕阿德教授 (A. C. Moule, 1873—1957)。他还上过日本文学的课, 老师是 1949 年起做了三年日语助理讲师的唐纳德·基恩 (Donald Keene)。杜希德由学生进一步展开出色的学术生涯, 从基恩那里受益良多。^[1]

杜希德之后攻读博士学位, 开始写他所谓的唐代财政制度“急就章”, 导师还是中国学教授夏伦。杜希德自己说, 他首先得说服夏伦, 比起西周到汉末的早期历史, 中古史同样值得学术研究。他说夏伦曾这样反驳, “你这不是历史学, 是新闻报道”。他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旧唐书·食货志》的翻译和注解。他和龙彼得 (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 一起读书, 后者 1948 年成为剑桥讲师。两人都出身战后欧洲传统的“高级汉学” (high Sinology), 在语文学、文本分析方面受过同样的训练, 因此两人在分析早期文本时有共同语言。不过他们两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后来越来越不一样。龙彼得对中国社会感兴趣, 尤其是区域底层社会, 热衷于考察民间神灵, 杜希德始终不放弃自上而下的路径, 也就是他面对的那些丰富而详细的官修制度史材料所反映的视角。两人的区别一直延续到退休: 龙彼得带病到中国南方做田野, 杜希德只是 1981 年到中国做了一次蜻蜓点水式的访问。不过杜希德的博士论文为他著作等身的研究

[1] Donald Keene, *On Familiar Terms: a Journey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1994, p. 103.

生涯的最初阶段奠定了基础，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史和财政运作，其次是制度史及制度文献史。

杜希德之后被派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到1954年他追随唐代法律和制度史大家仁井田陞（1904—1966）学习东洋史。他后来称仁井田陞对他来说亦师亦友。^{〔2〕}这以后，他终生都对日本杰出的中国史学者和日本文化充满敬意。他多次访问日本，与众多日本学者保持着联系。他也熟知日本史，甚至曾提过，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就不会以中古中国史为专业，而会去研究文献记录非常丰富的江户时代日本经济史。不过他对日本学术界的态度是选择性的，喜欢京都学派擅长的严谨的经验分析。杜希德曾批评过一位学者，因为后者更倾心于理论和概括的研究路子。^{〔3〕}1953年，他与在京都结识的市川梅子（Ichikawa Umeko）成婚，岳父是当地的染织家和面料设计师。

1954年杜希德返回英国，1955年得到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4—1956年到亚非学院出任远东历史讲师，当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1954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FBA〕）是中国学教授。

他之后回到剑桥继续学术事业，成为剑桥的古代汉语讲师。当时中国学教授是加拿大人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曾得到古典学学位，在亚非学院学习中国学，1953年出任剑桥中国学教授。蒲立本和杜希德一样，是唐史专家，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蒲立本和杜希德”总是被相提并论，两人都是西方

〔2〕 Niida Noboru and Chinese legal history, *Asia Major*, ns. 12. 2, 1967, 218—228.

〔3〕 Review of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1973, The real problems of Chinese history, *Times Library Supplement*, 17, Aug., p. 948. 当然是匿名评论。

学界高产的唐史学者，于是比较两者就成了学界热议的话题。一般认为，蒲立本的想法是曲线的，杜希德是直线的，持续而直接。蒲立本写作《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这本极富创见和论证扎实的著作后，^{〔4〕}兴趣转移到历史语文学，最后投身于比较古代汉语和印欧语言之间可能的联系。杜希德从来没有放弃他对中国中古史的初衷，他大量的研究成果都与此相关。

杜希德先后在剑桥、伦敦任职之后又回剑桥，都在蒲立本手下任职，1960年开始有了一个正教授职位，他接任西门华德成为亚非学院中国学教授。杜希德家壁炉上非常显眼地摆着一张明信片，是挚友芮沃寿（Arthur Wright，1913—1976）寄来的，明信片上，老师看着要到剑桥北部阿伯里路（Arbury road）远足的学生说，在新的位置“从新的高度警醒自己”，这话也像是说给杜希德的。在亚非学院，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东系主任，因此也是系主任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成员。这一阶段成为他在全中国学术界最活跃的时期。1967年蒲立本打算带着妻子返回加拿大，到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教授。剑桥教席由此空缺，杜希德于是回到剑桥继蒲立本之后于1968—1980年间出任中国学教授。

这几十年间，中国学界变化翻天覆地。在中国国内，频繁的政治运动非常不利于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学界联系绝无可能。杜希德后来曾写道，“‘文革’是难以置信的人类灾难和令人震惊的毁灭”。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才稍有可能缓和一些。就杜希德看来，情形稍有好转主要靠的是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大幅公布，多关于早期上古，不过也有中古时代的。这对中国人而言是相当自豪的文化成就，因此更多地面向公众，而

〔4〕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to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1955.

不只是学术界。杜希德始终重视这些新材料，并不时有所回应，这些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面貌。

1949年后中国学界被残酷的政治运动左右，他对这一局面毫无兴趣。60年代在剑桥，70年代在伦敦，左翼思想家和为数不少的学生看出毛思想的价值，可能在中国之外获得支持。这些人中颇有一些名声赫赫的大佬，最为人所知者比如琼·鲁滨孙（Joan Robinson，1903—1983，1958年当选FBA）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1971年当选FBA）。60年代后期，学生受到巴黎、柏林事件的影响，也开始反对美国越战，局面如火如荼，杜希德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也不支持共产党的死敌国民党。杜希德始终努力避免将中国历史研究纳入任何决定论的框架，很多年后他说，“我们不需要关于人类发展的宏大而普遍的理论，我们也不需要……试着把中国史塞入这一理论当中”。他这里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都为马克思主义所笼罩。^{〔5〕}1996年回头反思此事，考虑到和1960年代中国的联系，这些人也和煽动者无甚区别。

针对60年代末严酷的气氛，杜希德转而动议提升语言教育，增加教师职位。他一直特别注重提升高中生对中国的兴趣，在亚非学院，他“和全国三十所高中签署了协议，由亚非学院提供支持开展中文教育，既为了增加数量，也为了提升水准”。不过最后，只有阿宾顿（Abingdon）中学长久地坚持了下来，聘任亚非学院毕业生担任中文教师。^{〔6〕}在此期间，他还试着为

〔5〕 Fu Ssu-nien Memorial Lectures, 1996,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6〕 Hugh Baker, And what should they know of SOAS, who only SOAS know?, in David Arnold and Christopher Shackle eds., *SOAS Since the Sixti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 p. 171.

中国研究提供人才。1966年，他在伦敦召集会议，提议建立中国学者学会，甚至拟定了筹委会的名单。不过因左翼势力的反对，该计划最终还是流产。

杜希德还通过其他方式推动基础语言教育。亚非学院任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设计并且试着建立了一门大学学前课程，要求那些行将进入英国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习汉语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参加长达一年的强化语言训练。课程相当紧张。不过这个课程到底应该设在哪里，大学间一直争执不下，新兴的中国学系也会忧虑自身独立性的问题。最终，令杜希德沮丧的是，大学资助委员会撤销了对这一计划的支持。

1968年回到剑桥以后，杜希德依然继续主张加强汉语语言学和现代汉语的教学，聘请古代中国史教师，而不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聪明然而特立独行的历史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1964—1969年间是现代中国史助理讲师，不过后来没有续聘，也没有升职。他后来到格拉斯哥、牛津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继续撰写极具锋芒、影响深远、具有学术洞察力的作品。李约瑟好友伯纳尔（J. D. Bernal, 1901—1971）之子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凭着左翼身份享受特殊待遇，60年代初曾到北京留学，还成功组织了剑桥反越战运动，是当时国王学院的研究助理。他在1967—1968年间开设的课程中，有明清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没有得到终身教职。伊懋可现代中国史的位子空出来后，杜希德聘了一位古代史学者，让他负责本科生的现代汉语文献导读课程。1974年，他聘请了毕业于剑桥的巴瑞特（Timothy Barrett）博士任助理讲师，巴瑞特专长是宗教研究，导师是杜希德亚非学院前同事、后来任教耶鲁的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巴瑞特的学术生涯非常精彩，现在是亚非学院东亚历史教授，也是一位古代史学者。

建立大学前课程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杜希德后来又开展了闻名剑桥的中国语言项目（Chinese Language Project）。他从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找来一笔钱，聘请一位副研究员和两位语言教师。这个项目受学校委员会监督，目的在于编写供全校使用的新语言教材。主持者是从皇家空军调过来的中校斯劳斯，退休前一直担任剑桥中文校级讲师。少数非常积极的毕业生，比如《纽约时报》通讯员、后来出任执行主编长达七年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当时已事业小有成就，也参与了一年期强化汉语教学项目。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1973年资金用光为止。这个项目的学生专心致志，效率极高，出类拔萃，他们可以阅读一篇“文革”样板戏的戏文，虽然可能无法做到完全意会。

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按照这个方式训练更多的现代汉语专家大有必要。不过把这样的“转换课程”引入常规的研究或学位培养计划仍然困难重重。中国语言项目以及杜希德对更好、易得汉语基础训练的持续关注，期待英国大学中国研究系到2000年可以在政府基金支持下展开研究生转换课程。汉语项目开展以来，对于所有“二外”学习者短期达到可观水准的挑战依然如故，该项目应该继续下去。不过三十年前，杜希德对此焦头烂额，源于英国高校系统资源匮乏。这是他70年代逐渐开始寻求北美职业机会的潜在原因。在美国，有规模更大、更雄厚的计划，转换课程和基础语言训练的客观条件更充沛。研究生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报编辑工作的空间也更广阔。

斯劳斯在汉语项目结束后还一直是汉语讲师。虽然讲师是一门充满艰辛的职业，但他一直服膺于杜希德，所以是他在剑桥郊外马丁利教堂（Madingley Church）杜希德先生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

1966年汉语项目失败后，杜希德对职业学会保持冷眼旁

观，其中一些成员在左派狂热分子当道时遭到了迫害。他没有参加1974年英国访华汉学家代表团，这些人的内讧在当时学界搞得满城风雨。杜希德也没有参与为人熟知的青年汉学家学会（Younger Sinologists），这个团体当时在欧洲范围内定期召开会议，杜希德的剑桥同事龙彼得就是骨干。他也与英国中国学会保持距离，1976年春一波青年汉学家成功访问中国后，在科隆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立了这个学会。这个新学会致力于摆脱此前的左右之争，为政府提供独立的新见解。不过杜希德一直和英国内外青年汉学家保持着联系。1969年，他邀请砺波护和池田温两位日本学者参加剑桥唐史研讨会，两位现在都是深有威望的唐史专家。杜希德指导了大量博士生，现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地任教。

1974年开始，杜希德频繁访美，成为他后来转战普林斯顿大学的基础。70年代早期，他对北美中国研究印象不能算好，依然认为，英国学术，特别是单学科学位的传统，是英国成为研究与教学首选之地的原因。对于那些想要接受美国大学工作邀请的年轻同事，杜希德的忠告只有一条，那就是除非无比确认自己想去那样的地方才行。他1980年离开了英国，直到19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首任胡应湘（Gorden Wu）讲座教授。在普大，他继续编辑与研究的工作，也参加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或称“全美学术界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后者正是他1960年代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会议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在普大教职人员发布的讣告中也提到，杜希德“持续指导中古史的博士论文，他的学生目前任职于中国台湾、新加坡和美国，包括普林斯顿”。

不过杜希德的根一直在英国，1994年退休后，他回到剑桥北部的老家，初入学界、执教剑桥伊始他就住在这里。他在这里有一座舒适的大房子，和儿孙共聚一堂，直至2006年2月

去世。

二

杜希德洞烛幽微，不接受左翼思潮，但他绝不是传统、保守的学者。在学术圈他有不少钦慕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自欧洲大陆，包括马伯乐（Henri Maspero，1863—1945）、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两人都在极权政权下有过惨痛的人生际遇，马伯乐甚至因此丧命；此外还有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他受人类学启发对《诗经》进行了重新研究，非常有影响。晚近的法国学者当中，他还欣赏研究中国佛教和诗歌的历史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1969年当选FBA）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1996年当选FBA），后者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引起杜希德的共鸣。

杜希德这代人的著作最终彻底改变了英国中国学研究的面貌，扩展了研究范畴。此前一代以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1945年当选FBA）为代表。魏礼是一位翻译家，对文学最感兴趣。他的读者是久经世故的普罗大众。曾有评论称，魏礼的妙处在于“惟妙惟肖”，源于他精致典雅的译笔和将中文、日文文献恰当地翻成英文那种超凡而又扎实的功夫。就此而言，魏礼是翟理斯研究风格的继承者。翟理斯是剑桥第二位中国学教授，将他所谓“中国诗歌瑰宝”译成了英文，带给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上流人士。

杜希德认可魏礼的学术品质，也欣赏他的渊博，不过他极其反感布鲁姆斯伯里俱乐部（Bloomsbury Group）的矫揉造作，杜希德的中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此截然不同。比如魏礼含蓄地指出唐代诗人兼官员的白居易（772—846），至少在退休安居洛阳时代，精神状态仿佛伦敦自由俱乐部的资深成员。魏礼

称白居易写于795—805年间的五十首政治讽喻诗，是“写给《泰晤士报》的信”^[7]。杜希德长久以来对白居易的大量著述深感兴趣，但他在其中看到的，并非当时城市精英的装腔作势，而是为当时朝廷和百官面临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具体而微又丰富多元分析的可能性。

如果杜希德与魏礼的关系尚属诚恳友善，那么与那些当时英国学术界的二流人物的相处就不那么顺当了，最有名的就是李约瑟。和魏礼一样，李约瑟也出身剑桥，不过专业和中国毫不搭界。和魏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李约瑟一直待在剑桥。有些人把杜希德和李约瑟之间交恶归因于杜希德一篇发表于《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对李约瑟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三的评论。不过，读一下这篇评论就会发现，那是一篇具有建设性和充满友善的文字，毫无敌意。积极地说，这类评论也很难成为两位同一机构的职业学者终生交恶的原因。^[8] 对李约瑟的汉学研究，包括他处理文献的方法和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认识持保留态度，杜希德绝不是唯一者。他同样有着严谨的语文学立场和文本—历史标准的剑桥同事龙彼得也这么看。其实杜希德也以各种方式对李约瑟表示善意，比如他会推荐本科生去读李约瑟关于中国时间观的论文。^[9]

然而李约瑟曾说，他和东方学系之间竖着一块“玻璃板”。李约瑟后来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研究所，法律和运作都是独立

[7] Arthur Wa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London, 1949, p. 62.

[8] D. C. Twitchett, review of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I, *Mathematics and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xlvii, 877pp., 75 plates, Cambridge, 1959,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5 Part I, 1962, 186–189.

[9] Joseph Needham, Time and eastern man, in his *The Grand Titration*, London, 1969, pp. 218–298.

的，虽然事实上内嵌并依赖于学校。他和鲁桂珍（1904—1991）以“不能连累后继者”为由，从不提供任何教学机会。也许拒绝教学反倒加剧了学者和研究所在名义和实质上的分离。研究所确实走了一条独立的路。1985年，李约瑟试图从更富有的学院为新楼寻募经费，结果除了从克莱尔学堂（Clare Hall）得到一点不值一提的赞助外一无所获，至此关系彻底搞僵了。杜希德几年前已经去了美国发展。不过若是没走，也很难相信他会同意支持这个连他自己也拿不准的项目。李约瑟研究所因为李约瑟之名在东亚声名赫赫，然而那里很多人搞乱了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著述偶有佳作，但整体参差不齐。最重要的是，坚决按照自己思路单干的做法，导致这个研究所对于东方学系中国组和杜希德之后的中国学教授而言始终是个大麻烦。不过事到如今，良好而富有成果的合作比过去顺利多了。杜希德到晚年至少也在口头上认可李约瑟在建立中国科学史专业方面的巨大成就，称他是“令人钦佩的人物”。

毕铿（Laurence Picken, 1909—2007, 1973年当选FBA）^[10]和李约瑟一样也是剑桥的科学家，对中国着迷，作出了坚实的贡献。他研究唐代宫廷音乐的历史，对此杜希德只是支持和鼓励。毕铿对文本一丝不苟，他通过日本文献试着复原唐代宫廷礼乐的曲谱，杜希德认为这一创造性工作的成就是相当非凡的。

杜希德从来不在东亚任何地方作长期逗留，若非极特殊的情况，恐怕很难改变他对此的固执。在美国教书期间，他有很多优秀的台湾学生，因此和台湾地区学术界及其最高机构中研院史语所一直保持着联系。1996年，他接受史语所邀请到台北南港进行傅斯年讲座。访台三周期间，杜希德受到了极其周到的接待，这次访问成为他后来很多年间的美好回忆。更重要的

[10] 毕铿生平参本卷（见文末本文原刊）Richard Widdess 撰文，pp. 227—255.

是，他的三次讲演正式整理出版，成为此行的宝贵记录，同时也展现了当时他正在考虑的问题。杜希德死后，藏书由傅斯年图书馆接手，至今仍藏于斯。

三

东亚局势在杜希德学术生涯期间经历了巨变。在他刚学日语时，英国与日本海陆交战，在亚洲大陆，中国先是抗日，后来又国共内战。50年代他从中国研究专业毕业时，共产党正式接管中国。紧接着就是“韩战”，英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猛烈交战。1979年之后，东亚政局才稍微好转，与中国的联系才逐步正常。不过尽管如此，2006年初杜希德去世的时候，东亚和全球秩序才真正初露端倪。

比起中国政治局面的翻天覆地，东亚研究学术环境的变化也丝毫不逊色。杜希德刚入行那时候，他坐船去东亚用了七周。写文章主要靠打字机和复写纸。要在英文里植入汉字，或者手工，或者油印，或者最后排进去，总之百分百靠手工。到他退休的时候，坐飞机去东亚一天不到，数字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写作和发表的方式。

杜希德总是走在巨变的前头，他对此把握十足。他中学就通欧洲各种语言，又掌握了东亚文字，足以成为学术界的领头羊。他乐此不疲地阅读日文研究，对20世纪中叶关于古代中国经济史最优秀的研究论著毫不陌生。在杜希德职业生涯初期，盛赞他对中古中国文献学术语言娴熟掌握的人，绝不止哈佛的杨联陞（1914—1990）一位。对于任何入目、稍有关系的学术论著他都兴趣盎然，而且读得特别快。他绝对有超强的“直线思维”的能力，对社会、经济和制度史等问题具体考察然后写成学术论文，没有天赋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四十年间，杜希德

的系列论文始终位居前沿，大多数显然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他曾说自己“一开始是自然地理学者，毕业于欧洲汉学高级传统（high tradition of European Sinology），在经济史领域工作，又在语言文学系搞行政”。所有这些截然不同的领域对杜希德的学术生涯影响深远，共同使他成为一位后来那样圆融贯通的人文学者。他早期训练中唯一缺失的就是历史学。1954年在亚非学院远东系当讲师后，杜希德曾说，“自从高中毕业就没上过任何历史课”。他通过研究和教学实践，自学成长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成功也够反讽的，因为但凡读过他的论文，或用过他策划和主编的《剑桥中国史》，都想不到他从没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跨学科”在今天不算什么，在中国研究领域也经常被用作挡箭牌，以掩饰研究生课程中偶有薄弱之处，但在五六十年代，隔行如隔山，跨学科绝非易事。

早年自然地理学的训练带给杜希德进入中国制度史时的方法技巧。他特别注意描述行政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白乐日所谓的“行政实况”（administrative reality）、以区别于意识形态所塑面目的能力是经济史家必不可少的技能。对地形学的敏感，使得杜希德能够简洁又准确地呈现唐朝包括西域、吐蕃和突厥—蒙古在内的边远地区复杂多变的历史。因为具备地理学家的技术和对地理测绘的兴趣，杜希德后来成为《泰晤士中国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China*）的主编之一。^[11]

在追随仁井田陞的学习过程中，杜希德得以了解中国行政制度典籍是何等广博复杂。他很快掌握了中古法律和刑罚系统的术语。60年代中期他能马上给大众做一次中古法律体系的讲

[11] P. M. J. Geelan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London, 1974.